

# 技术异化的现代性困境及其破解的人性论基础

魏忠明,邵诗安

(湖北工业大学 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湖北 武汉 430068)

[摘要]当今社会,随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日益分离且渐行渐远,“技术的异化”与“理性的泛滥”互为因果,继而导致“自由的沦落”与“信仰的缺失”,并最终产生现代性困境。康德有限理性存在者思想从理论理性、实践理性和幸福期望三方面揭示了人的有限性,并以此为基础来建构其批判哲学体系。适时地回溯康德的有限理性存在者思想,能够为技术批判寻找合理的人性论基础,最终有利于破解技术异化所导致的现代性困境。

[关键词]技术异化;技术批判;现代性困境;有限理性存在者思想;康德

[中图分类号]B1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34X(2020)05-0035-07

DOI:10.16573/j.cnki.1672-934x.2020.05.005

## The Modernity Dilemma of Technological Alienation and the Foundation of Human Nature Theory for Its Decoding

WEI Zhong-ming, SHAO Shi-an

(Institute of Western Marxism, Hub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Hubei 430068, China)

**Abstract:** In today's society, as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and value rationality increasingly separate and go far gradually from each other, "technical alienation" and "rational overflow" are mutually causative, which leads to "freedom decline" and "faith loss" and finally gives rise to modernity dilemma. Kant's thought of finite rational existent reveals human's finiteness from three aspects: theoretical rationality, practical rationality and happiness expectation, and constructs his critical philosophical system on this basis. Timely retrospect Kant's thought of finite rational existent can find a reasonable basis of human nature for technical criticism, which is finally conducive to solving the modernity dilemma caused by technological alienation.

**Key words:** technical alienation; technical criticism; modernity dilemma; thought of finite rational existent; Kant

在古代,人的主体性凭借技术而萌发于生活之始,人基于技术而生活,同时也基于生活而技术——技术是生活的技术,生活是技术的生

活,技术与生活是相互支撑、相互依存、相互构建的。在近代,“我思故我在”与“知识就是力量”的时代宣言,在高扬人的主体性的同时,也

收稿日期:2020-07-19

基金项目:湖北省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2017006)

作者简介:魏忠明(1974—),男,湖北广水人,副教授,哲学博士,主要从事西方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应用伦理学等研究;邵诗安(1992—),男,湖北荆门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国外马克思主义。

(C)1994-202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促使生活水平与技术都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和进步,生活因知识的丰富而更加宽广和辽阔,技术因知识的增长而更加成熟和先进,然而技术的发展水平与层级还受人的主体性等若干条件的制约,技术虽然可以在生活中“自由飞翔”,但仍然不能克服生活的“地心引力”,技术尚未成为一种独立的力量而摆脱生活的约束。在现代,技术凭借资本这个“助飞剂”的推动力越来越高而逐渐摆脱生活的“地心引力”制约,逐渐摆脱人的伦理道德约束,技术一旦脱离生活的制约和摆脱人的约束,它就会按照其自身所固有的发展逻辑向前演进,最终成为一种独立的力量,反过来支配和操控人的生活、思想和行为,人成了适应技术发展需要的工具,人的主体性地位丧失<sup>[1]</sup>,人类面临着因技术的异化而引发的现代性困境。

要走出这种现代性困境,技术必须祛魅,去资本之魅;生活必须去远,去离弃之远<sup>[2]</sup>。而要去技术的资本之魅、去生活的离弃之远则必须对人的主体性进行重建,必须对技术进行反思,必须对生活进行再构。也就是说,必须对人在宇宙中的位置进行再认识。而康德在其批判哲学中所彰显的有限理性存在者思想,则为重新认识人在宇宙中的位置提供方法论参考,为有效批判“异化技术”提供人性论基础,为合理破解现代性困境提供可能性出口。

### 一、技术的异化及其现代性困境

作为一个事件,“技术的异化”不是从来就有,也不会永远存续下去,有其缘起、发展与消解的历史性过程。在人类社会形成之初,人、生活和技术构成了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三个变量,它们共同推动人类社会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向前迈进。在前现代社会,人、生活和技术三者之间彼此提携而相互促进,从根本上确保了人类社会的良性发展。然而,一旦人类踏进现代社会的大门之后,人、生活和技术三者之

间就彼此提防而相互掣肘,技术“异化”了,生活“暗淡化”了,人“空场化”了,于是种种现代性问题接踵沓来,并最终让人类面临现代性困境。所谓的“现代性困境”,主要是指在现代社会中,由于“技术的异化”而导致人类社会在生存论层面出现这样或那样的现代性问题,这些问题或直接或间接地威胁着人类的生存,或现实或潜在地制约着人类的发展。“技术的异化”就在于技术的“过度”“不恰当”使用,它是导致生活“暗淡”、人“空场”的直接诱因,也是现代性困境得以出现的主要原因。现代性困境通过诸多现代性问题来显现,它是技术异化、生活暗淡、人的空场等持续存在的必然结果。然而,无论是原因还是结果,它们均与人紧密相联,均与人性论息息相关。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现代性的实质就是,在将人看作拥有理性力量的主体、将世界看作可以支配操控的客体之时,还将理性视为人、社会和自然的根据,于是,现代性一方面助推生产率的提高、财富的增长、自由民主平等的实现等积极性进步,另一方面也导致工具理性的泛滥、人文价值的失落等严重后果<sup>[3]</sup>。现代性问题既可以抽象地概括为理性的泛滥、自由的沦落与信仰的缺失三个特征,也可以具体地归属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及人与上帝这三个领域,它们在总体上表征着现代社会中因技术异化而让人类面临现代性困境。

首先,技术将人与自然的关系演变成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关系,从而导致理性泛滥的现代性困境。在前现代社会,技术只是人从自然中获取生活资料、生产资料的一种手段,并且是以一种直接的、照面式的方式来使用技术。资源的匮乏与手段的欠缺,让人对自然产生一种敬畏的心理,并以一种卑微的姿态行走于自然之中。人虽然获得“万物之灵长”的头衔,但人毕竟还是一个生存于自然、发展于自然的“在者”。在现代社会,技术在资本的裹挟下逐渐演变成一种独立的力量,而人则凭借这种力量

跳到自然之外,并成为自然的征服者。自然,不再是人安身立命的家园,而是变成了工业源源不断的原料产地,变成了商品连绵不绝的倾销场所。通过技术追求利益最大化,成为人之所以生存的目标和追求;通过技术满足贪欲极致化,成为人之所以发展的具体表征。在技术的面前显现的是理性泛滥,在技术的背后隐藏的是理性越界,在技术的使用中生成的则是理性控制。总之,技术将人与自然的关系演变成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关系而任由理性泛滥成灾,这是现代性困境的第一个面向。

其次,技术将人与社会的关系演变成零件与机器的关系,从而导致自由沦落的现代性困境。基于机器大生产的时代要求与历史特质,现代社会一方面为其自身寻找到合法性理由,另一方面则与前现代社会相区别。在现代社会中,机器与资本的结合,使人在生产实践中逐渐让位于机器,并加速了人的自我的主体性退让<sup>[4]</sup>:人不再是社会有机体中的一个分子,而变成了无生命机器的一个零件;人不再是参与社会活动的积极主动者,而变成了机器生产的消极受动者。人没有了个性,没有了特点,人的体力和智力不得不依附于越来越复杂的机器,从而使人失去了创造性,成为机械系统的奴隶<sup>[5]</sup>。正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描述的那样,人在机器大生产过程中完完全全地异化为工人——工人不再是“人”而只是运用人之机能的“动物”而已。通过技术,现代社会变成一个庞大的生产机器,而人则只能成为这个机器上执行操作指令的一个零件;通过技术,现代社会遵循资本的逻辑来运转,而人则只是可以随时被替代的个件;通过技术,工人沦落为生产的符号代码,资本家则固化为资本的人格面具,无论是工人还是资本家均因自由的缺位而不再是人。总而言之,技术将人与社会的关系演变成零件与机器的关系而让人毫无自由可言,这是现代性困境的第二个面向。

最后,技术将人与上帝的关系演变成超人与虚无的关系,从而导致信仰缺失的现代性困境。在现代社会,随着思维水平的提升、认识的发展与科学的进步,曾经光照人类的那个全知、全能、全善的神圣上帝逐渐暗淡,技术让商品、货币与资本熠熠生辉并使新拜物教成为可能和现实,人则通过技术统治来支配万物而变成超人<sup>[6]</sup>:人变成了仅仅追逐金钱、利润的超人,而无视神圣信仰的存在;人变成了仅仅满足图表、数字的超人,而放弃精神性理想的目标。但人毕竟不是动物,行走于天地之间的人所能紧紧依靠的,终究还是人的信仰与希望。唯有信仰,才能使人在事实领域之外确立其存在的终极意义;唯有希望,才能在价值领域之内实现其发展的根本目标;唯有信仰与希望,才能使人成其为人。当技术宣布“上帝死了”的时候,作为其逻辑必然结果的“人死了”也注定会到来;当技术把人变成了图表、数字的奴隶的时候,人也就跟没有信仰的动物别无二致;当技术让人不再信仰上帝而只崇拜金钱的时候,人也就没有了任何神圣性的追求。总之,技术让人与上帝的关系演变成超人与虚无的关系从而导致信仰空洞无物,这是现代性困境的第三个面向。

## 二、技术批判的康德回溯

技术的批判,是指我们必须基于人与技术的关系来对技术进行批判性反思,以期发现技术能够“如其所是”地成为人、生活的手段与工具,而非“如其所不是”地成为人、生活的目的与旨归。在前现代社会,即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等传统社会里,人的主体性的提升与技术的缘起基本上是“同步”的,从时间上追问谁先谁后,既不可能也无必要;如此“同步”,人的主体性的提升与技术的缘起也基本上是“同向”的,从逻辑上追问谁因谁果,既无价值也无意义。对技、艺、道的不懈追求,是前现代社会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动力所在,这主要是因为,

前现代社会的技术,还基本上是为了人、服务人的技术;前现代社会的人,还基本上是发明技术、提升技术的人;前现代社会的生活,还基本上是人的、技术的生活;前现代社会的人、技术与生活三者基本上还是融为一体的。在现代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技术则完全有别于古典思想中作为“技艺”(craft)与“制造”(making)的传统观念<sup>[7]</sup>,而成为一种独立于人、外在于人的强大力量。技术的力量越来越强大而人的主体性却越来越下降,继而在从传统技术向现代技术的转变过程中,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区分虽然相当模糊,但仍然以工业革命将它们分界,于是,工业革命之前的技术被称之为传统技术,工业革命之后的技术则被称之为现代技术<sup>[8]</sup>,技术逐渐被“定为一尊”成为现代社会中的“新神”,而人则完全匍匐在地并以虔诚之心对技术顶礼膜拜。人与技术的关系来了一个“哥白尼式的转变”——如果说在前现代社会中,人是技术的中心,技术围绕人而旋转;那么到了现代社会里,技术则成了人的中心,人则围绕技术而旋转。在这一“哥白尼式的转变”过程中,失去主体性地位的人不再是原来的人,替代上帝的技术也不再是原来的技术,人的虚无化与技术的异化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也是一个过程的两个维度,它们共同表征着因技术的异化而形成的一种现代性困境。

康德的回溯,是指在当今社会下,我们重新回到康德的批判哲学,并在其中寻找到某种走出现代性困境的可能性方案。在技术的异化以及人主体性的虚无化的进程中,有限性与无限性的完全割裂,目的性与手段性的彼此颠倒,信仰性与世俗性的严重错位,既是现代性困境的根本原因也是现代性困境的直接后果。从本体论、存在论的角度来说,技术只能成为人的手段而不能被视为人的目的,技术终究只能是人的技术,离开了人的技术则只能沦为一种盲目的力量;人则既是有限性与无限性的弥合体,又是

手段性与目的性的结合体,还是信仰性与世俗性的综合体。因故,人在正视其有限性的客观现实之同时,还不能忽略其无限性的终极追求;人在完善其手段性的工具方式之同时,还不能遗忘其目的性的价值旨归;人在满足其世俗性的形下需求之同时,还不能放弃其信仰性的形上追求。为了认识人的本质特征,为了把握技术的内在规定,我们可以从康德及其批判哲学那里寻找某种参考。康德在批判理性过程中所形成的有限理性存在者思想,一方面扩展人类理性以提升人的主体性地位,另一方面又限制人类理性以防止人的主体性僭越,从而让宇宙中的人在回答“人是什么”的过程中处在其应该处的位置上。可见,康德及其批判哲学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我们对人、技术、生活及三者关系进行批判性反思与合理性构建。

“人是什么”这一问题,是康德批判哲学得以构建的最为关键的基础性问题。在回答这个问题的过程中,康德为形而上学的革命找到了其独特的立论基础,也为批判哲学的构建找到了其特有的体系基石。对康德及其批判哲学来说,“人是什么”被明确地提出,虽然出现相对较晚——康德是在 1800 年出版的《逻辑学》一书中才第一次极其明确地提出来——但“人是什么”却是萦绕于康德一生、贯穿于康德批判哲学始终的一个关键性问题,这是因为“先验哲学的那些伟大的课题:一般性与必然性、客观性与规律性、确信与真理、道德性与合法性、自然与自由、世界与上帝,仅仅由于人在其中寻找对他自己是什么和是谁这个问题的一种解答,才能获得其意义”<sup>[9]</sup>。“我能知道什么”“我应该做什么”“我可以希望什么”和“人是什么”这四个问题,共同构成了康德及其批判哲学的主题和主线,康德也正是在回答这四个问题的过程中形成了其独特的有限理性存在者思想。

正如康德所坦言的那样,这四个问题虽然存在于不同的学科领域,但它们在整体上构成

了一个有机的体系:形而上学回答“我能知道什么”,道德学回答“我应该做什么”,宗教学回答“我可以希望什么”,而人类学则回答“人是什么”,并且前三个问题都指向最后一个问题<sup>[10]</sup>。具体言之,其一,康德于《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对“我能知道什么”这一问题,在把握经验、追求真理的现象层面进行了形而上学的回答,并让人依赖于理论理性而成为认识主体。通过对理论理性的批判,康德在构建其知识学说的过程中发现,人的理论理性是有限的,在人的理论理性认识能力之外,还有一些人类无法认识的东西,人所获得的真理仅仅只是某一区间内的真理,人永远处于朝向真理的路途中。其二,康德于《实践理性批判》一书中对“我应该做什么”这一问题,在践履德行、追求自由的本体层面进行了伦理学的回答,并让人依靠实践理性而成为道德主体。通过对实践理性的批判,康德在形成其道德学说的过程中发现,人的实践理性是有限的,在人的实践理性道德活动之外,人还常常会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人所获得的自由仅仅只是某一范围内的自由,人永远处于走向自由的征途中。其三,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与《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两本著作中对“我可以期望什么”这一问题,在敬畏上帝、追求幸福的超验层面进行了宗教学的回答,并让人依仗于宗教情怀而成为信仰主体。通过对宗教神学的批判,康德在描述其道德神学的过程中发现,人的期望实现是有限的,在幸福期望的信仰领域之外,人还有一些今生现世实现不了的东西,人所获得的幸福仅仅只是某一限度内的幸福,人永远处于奔向幸福的旅途中。其四,康德在《实用人类学》一书中对“人是什么”这一问题,在不同于动物、区别于神的经验层面上进行了人类学的解答,并基于认识主体、实践主体与信仰主体的有限性而让人成为一个有限理性的存在者。

### 三、技术异化批判的人性论基础

通过对康德有限理性存在者思想的回溯,我们可以得知,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并且这种理性的有限性归根结底是因为人的有限性,是因为人自身本来就是一个有限性的存在。对于人而言,无论是肉体还是精神,无论是理智还是行动,无论是行为还是信仰,它们都受有限性的规定,我们为自身肉体的、感性的本质所局限,如此同时,我们的理智还直接与我们自己存在的限度相关,人的有限性则成为康德批判哲学的人性论基础。康德之所以能够在先验知识学、纯粹伦理学和形式宗教神学等领域完成“哥白尼式革命”,是与其有限性的人性论分不开的,在根本意义上,也正是这种有限性的人性论使康德及其批判哲学穿越历史时空而观照当下。康德有限理性存在者思想的人性论基础表明,人是有限的人。然而,人毕竟是感性与理性的矛盾体,是世俗性和神圣性的结合体,是有限性与无限性的统一体。特别在现代社会,人的理性往往会在感性的诱惑、物性的蛊惑、有限性的迷惑下僭越其界限而走向非理性,并让人面临着种种问题所形成的现代性困境。正如阿多尔诺所指出的那样,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与康德所处的时代是一样的,哲学不能放逐理性,不能废除理性,哲学要做的只能是对理性进行合理而恰当的批判<sup>[11]</sup>。因此,让“有限性”成为技术批判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也许能在根本上为破解技术异化的现代性困境寻找可能和现实的路径。

首先,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言,康德有限理性存在者思想为我们摒弃既有的“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关系”而构建一种新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提供人性论基础。无论是过去还是未来,人始终是自然不可或缺的一员,自然始终是人不可离弃的部分,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始终贯穿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之中。对于人而言,对人自身的认识有一个过程,对自然的认

识有一个过程,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也同样有一个过程。人曾经因技术的“不足”而在恐惧中敬畏自然,也曾经因技术的“过度”而在祛魅中控制自然,这一切的发生都是跟技术有关,跟技术的使用有关。康德有限理性存在者思想所揭示的“人永远处于朝向真理的路途中”的论断则警示人们,人的理论理性是有限的,人对自己、对自然、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知是有限的,自然之中的人,唯有在理论上清醒地认识这种有限性,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也许才有缓和的可能。

其次,对于人与社会的关系而言,康德有限理性存在者思想为我们将无生命的机械关系转变为有活力的有机联系提供人性论基础。作为启蒙思想家的卓越代表,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一书的开端就发出了“人生而自由却又无往不在枷锁之中”的时代呐喊。他“在开端中预见危机”<sup>[12]</sup>:人深陷商品的堆积失去了身心的愉悦,商品的极大丰富带给人的是巨大的精神匮乏;人追逐生产的过程却失去了闲暇的情致,物欲的极大满足带给人的不是愉悦而是莫大的心灵空虚。卢梭所生活的那个启蒙时代虽然业已远去,但卢梭所从事的启蒙事业尚未结束。技术的资本逻辑,让人的自由无处存身;社会的飞速运转,让启蒙事业更加艰难。这一切究竟是如何可能的?这一切又该如何化解?康德有限理性存在者思想所揭示的“人永远处于走向自由的征途中”的论断告诉人们,人的实践理性是有限的,人在社会中的行为、举止、行动是有限的,唯有在实践中正确地处置这种有限性,一种新的人与社会的关系也许才有构建的可能。

最后,对于人与上帝的关系而言,康德有限理性存在者思想有助于我们将对上帝的“伪侍奉”<sup>[13]</sup>转化为“真敬畏”提供人性论基础。“上帝”这一概念最早出现于中华先秦的古代典籍之中,西方古希腊时期是没有“上帝”的概念而只有“众神”的观念,只是到了中世纪时复数的

“众神”才变成了单数的“神”。“上帝”的产生之初只是人类抵御自然强力的一种心理需要,毕竟刚刚脱离动物的人在自然中是如此的羸弱和瘦小,而对上帝的信仰则让人有了坚持下去的勇气;“上帝”后来的存续则是人类为了克服社会强力的一种精神祈求,这是因为型构社会的人逐渐懂得了“人与人之间的斗争”不能仅仅停留在“狼与狼之间的斗争”层面上,人还需要组织起来以群体的力量、集体的智慧来谋求更好的生存与发展空间,对上帝的祈盼则让人有了团结的力量。到现代社会,技术让生存与发展的外在强力逐渐消解,资本让信仰与希望的神圣光辉逐渐暗淡,上帝“死”了,接着人也“死”了,既有的价值体系不复存在,新的道德规范又没有出场,人们不知所措,也不知如何是好。康德有限理性存在者思想所揭示的“人永远处于奔向幸福的旅途中”的论断则提醒人们,人的德福期望是有限的,人在今生今世中所能实现的幸福也是有限的,上帝的存在是人类的道德需要和确保德福一致的前提,期望之中的人,唯有对上帝充满敬畏,一种新的人与上帝的关系才有可能出现。

#### 四、结语

综上所述,对技术的审视,不能仅限于技术的制造和使用,更要关注技术的发展与人的发展是否相融;对技术的批判,不能仅仅只限于技术领域,更需要回到人本身,回到“人是什么”这一问题<sup>[14]</sup>。“人是什么”这一斯芬克斯之谜自出现以来,就吸引了一代又一代的哲人,就引出了一个又一个的答案。对于哲学而言,问题可能只有一个,但答案却不会仅仅只有一个,同一个问题在不同的时代也许会有不同的回答,但是哲学不是答案的堆积,哲学史也不是答案的形成史,“如果某位哲学史家只注重各种答案,把它们与问题分开,那他就会把哲学史和哲学思维变成僵死人工制品的无聊堆砌,就会把上

演话剧的真理舞台变成死范畴的荒原”<sup>[15]</sup>。康德是一个将问题与答案紧密结合的哲学家,他不仅再一次提出“人是什么”这个问题,而且通过对理论理性的批判来求解,通过对实践理性的批判来探析,通过对宗教神学的批判来追寻。康德在其批判哲学的逻辑发展和论证理路中,系统地形成了有限理性存在者思想。康德有限理性存在者思想全面揭示出人的有限性特点,鲜明表达了人永远在路上的特征,从而为其批判哲学找寻到人性论基础。这种有限性的人性论基础,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有效地破解甚至彻底走出现代社会中因理性的泛滥、自由的沦落、信仰的缺失而大量且普遍存在的现代性困境。简而言之,康德有限理性存在者思想分别从认识论、伦理学、宗教观等方面为破解技术异化所导致的现代性困境提供人性论基础。

#### [参考文献]

- [1] 闫坤如,曹彦娜.技术主体异化维度及其探源[J].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10-16.
- [2] 魏忠明.走出生活技术化的生存论困境:技术的祛魅与生活的去远[J].哲学分析,2015(3):17-25.
- [3] 李宝文.具体辩证法与现代性批判[M].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2.
- [4] 赵泽林.机器与现代性:马克思及其之后的历史与逻辑启示[J].哲学研究,2020(4):46-54.
- [5] 易显飞.创新驱动发展——技术创新与当代社会研究[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6:176.
- [6] 孙周兴.末人、超人与未来人[J].哲学研究,2019(2):107-117.
- [7] 刘佳男,郭婧.超越技术决定论与常识主义技术观[J].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4):25-31.
- [8] 梅其君,王立平.现代文化之技术本质——基于海德格尔的观点[J].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10-14.
- [9] [德]福尔克尔·格哈特.伊曼努尔康德:理性与生命[M].舒远招,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199.
- [10] [德]康德.逻辑学[A]//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9卷)[C].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24.
- [11] [美]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M].张峰,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14.
- [12] 田冠浩.卢梭的三组范畴对现代文明的重写[J].哲学研究,2018(6):81-87.
- [13] [美]艾伦·伍德.康德理性神学[M].邱文元,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5.
- [14] 易显飞,刘壮.当代新兴人类增强技术的“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理论主张及论争启示[J].世界哲学,2020(1):151-159.
- [15] [捷]科西克.具体的辩证法[M].刘玉贤,译.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5:160.